

· 妇女史研究 ·

妇女的自我感受: 郑琼与杨牢的婚姻情感生活^①

李志生

(北京大学 北京 100871)

摘要: 自我感受是社会性别理论的重要内容,用以考量妇女生活的真情实感。考察妇女自我感受的结果,或可改变对历史问题的成规固见。妇女自我感受的获得,一般取自于女性自己的书写——女性材料,但唐朝的妇女写作不盛行,留下来的女性书写有限且真伪难辨。因受限于史料,唐时妇女自我感受这一命题,一直是研究中的难点。选取郑琼与杨牢的婚姻情感生活,以郑琼的婚姻心理和感受为研究重点,通过对郑琼情感世界的分析,借以提出一种在女性史料缺失时,考察妇女自我感受的路径,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。

关键词: 自我感受; 女性史料; 同理心; 文化史; 夫妻情感

中图分类号: C913.13

文献标识码: A

文章编号: 1008-6838(2017)05-0052-10

对妇女自我感受的强调,是社会性别理论(Gender)的重要贡献^②,而以妇女的视角进行观察,“寻找妇女在过去历史中的声音”,或可改变对历史问题的认识,对此,美国学者孙康宜曾谈到:

胡文楷的《历代妇女著作考》对我们这些在美国学院中作研究的人启发特别大,它使我们惊喜地发现,原来西方女性主义的某些论断并不适用于中国的具体情况,而“五四”以来把妇女完全说成是封建礼教牺牲品的话语也过于绝对化^[1]。

学者们对众多明清女性材料的运用、对女性自我感受的探究,不但颠覆了这一时期妇女受压迫的传统认识模式,还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对明清社会的认识。妇女自我感受的获得,一般取自

于女性材料,明清时期的女作家众多,学者可以依此而展开对妇女自我感受的探寻。但唐朝时,妇女的写作并不盛行,留下来的女性书写不但有限,而且有些还真伪难辨^③。如此,唐时妇女自我感受这一命题,因受限于史料,就成了研究中的一个难点。

女性史料匮乏,我们就不得不重拾男性书写。至于本文,关于郑琼与杨牢的婚姻情感生活,就不得不主要使用男性材料,特别是相关当事人的墓志。但对这些男性材料,我们改换思考方式,从而作出新的解读,即在对相关史料作历史学解读后,以“同理心”的方法^④分析相关男性史料中的妇女体验,并辅之以其他心理学理论,以发掘妇女的自我感受。

杨牢,中唐时期的著名文人,其妻郑琼,弟杨宇,弟妻杜綯,这4位杨氏家族成员的墓志都流

收稿日期: 2017-07-03

作者简介: 李志生(1962—),女,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,主要从事中国妇女史、唐代社会史研究。

· 52 ·

传于世,因此,为我们留下了一份较完整而宝贵的家族生活资料^⑤,更为我们透露了郑琼与杨牢隐秘的婚姻情感世界,使我们可以透过性别视角,特别是郑琼的感受,来观察他们的喜乐悲哀。

撰写本文还有另一个目的,即对史学“科学化”的反思。史学“科学化”的最大弊端,是“见物不见人”,而忽略“人们在具体生活情境中的日常经历”,就无法了解人们的真正“需求”,也就无法说明历史发展的动力^[2]。历史和现实相似,大的数据固然重要,但拥有海量数据,也未必能够了解人类和人类的动机,目前世界上掌握数据最多的公司是谷歌,它得出的感觉就是如此^[3]。至于唐代妇女的婚姻,学者的研究取径一般也是基于数据的统计和分析,诸如婚龄、生育(次数、间隔)、卒年等,而这些数字背后的人的真实生存状态,我们鲜有所知。本文希望以这一个案研究,来探讨郑琼这位女子在婚姻中的真情实感,以此而推及千千万万像她一样命运的女子。

一、杨牢的出身和德性

中国古代的妇女是被定义为“从人”者的,“妇人从人者也”,“嫁从夫”(《礼记·郊特性》),婚后的妇女,须围绕丈夫或夫族生活,故而对郑琼婚姻情感的探讨,也要从她的夫君杨牢谈起。

杨牢,弘农华阴人,出自于关中郡姓之家。关于士族对家门、家风的意义,钱穆先生总结说:“当时门第传统共同理想……不外两大要目:一则希望其能具孝友之内行,一则希望其能有经籍文史学业之修养。……其前一项表现,则成为家风,后一项之表现,则成为家学。”^[4]在杨牢身上,就极具士族文化的这两大特征。

杨牢自少就颇具孝道之内行,他还曾被誉为“孝童”,称名于一时:

始,河南人杨牢,字松年,有至行。甘方未显,以书荐于尹曰:“执事之部孝童杨牢,父茂卿,从田氏府,赵军反,杀田氏,茂卿死。牢之兄蜀,三往索父丧,虑死不果至。牢自洛阳走常山二千里,号伏叛垒,委发羸骸,有可怜状,讎意感解,

以尸还之。单纁冬月,往来太行间,冻肤皴痂,衔哀雨血。……闻牢之赎丧,潞帅偿其费,其葬也,滑帅贖之财……”^[5]

杨牢父死于长庆元年(821年)的镇州(今河北正定)王廷凑兵乱,杨牢以至孝之诚,单身赴叛镇以求父尸的“壮举”,深深感动、震撼了其时之人。

成年后的杨牢步入仕途,任官于外。此时,是其弟杨宇承担起了养亲之责,这可见杨牢的《赠舍弟》一诗:“秦云蜀浪两堪愁,尔养晨昏我远游。千里客心难寄梦,两行乡泪为君流。”^[6]“尔养晨昏我远游”一句,既说明了杨宇的奉养老母,也表明了杨牢远于晨定昏省的愧疚,更彰显了杨氏兄弟间的友悌。杨牢对弟弟的情谊,还表现在他为杨宇撰写的墓志中:杨牢对爱弟早亡的痛挽与忿怨,对他才高八斗但命运多舛的抱恨,对爱弟品行的赞叹,等等,都使读者感到了一种摄人的真情。杨牢兄弟所展现的这种兄友弟悌,正是士族家风的体现。

杨牢也极具经籍文史的修养。早在六岁时,他就现诗才:“六岁时就学归,误入人家,乃父友也。二丈人弹棋次,见杨氏子,戏曰:‘尔能为丈人咏此局否?’杨登时叉手咏曰:‘魁形下方天顶凸,二十四寸窗中月。’父友惊抚其首,遗以梨栗,曰:‘尔后必有文。’”^[7]^[P317]成年后,杨牢更是“学深《左传》,尤博史书,百家诸子,咸在于口”,“其文好古,其书以诗,自得于天……时辈之中,所谓拔乎其萃也……有集卅卷”^[8]^[P2358],有“诗集六十卷”^[7]^[P317]。故在其年刚27(虚岁28),即登进士第^⑥,以这样的年龄中举,是被时人视作年轻有为的——“在诸生为少俊”^[9]^[P2294]。

杨牢的经籍文史之学,一是得益于家学传承,二是私学的养成。杨氏家学深厚,这在杨牢兄弟墓志中都有提及,“家世进士”^[8]^[P2358];“王父讳稷,文行高于时而困于不遇;皇考讳茂卿,字士蕤,元和六年登进士科”^[9]^[P2294]。杨牢兄弟也都曾就读于私学,杨牢参加科举考试,就是“始自乡荐”^[8]^[P2358],而乡荐是指地方州县从私学选拔、考试诸生,取合格者,荐于礼部贡院参加科考;杨

宇也是“有从师久不能辨者”^[9] [P2294], 此“师”也当是私学之师。

综此, 杨牢出身于关中高门之家, 有着其时社会推崇的孝悌之德和文学之才, 在“少俊”之年, 就已登科为进士。正是杨牢家昔日的门第与他耀目的才华, 引来了一个婚宦两全家族的联姻。

二、郑琼的出身和婚配

郑琼, 依其夫杨牢为她撰写的墓志, 出身于一个婚宦两全的高门之家: 父系“荥阳人, 当魏孝文时, 族氏为山东第一, 显于时固矣”; 母系, “外祖赵郡李公”^① [P2214]。父母两系均为唐时的头等士族——荥阳郑氏和赵郡李氏。但杨牢对郑琼本宗和外宗门第的这些记载, 并不能从其他史料中得到佐证, 所以暂时无从判断真伪。退而言之, 不论真伪, 这并不妨碍杨牢对夫人高门的认同, 并以此为傲。

郑琼父母两系的从宦也同样显赫, 祖郑侑, 官至河中少尹(从四品下), 父博古, 在其病故时, 任官盐铁司、殿中侍御史(从七品下), 品级不高但职位清显。外祖李恂, 官至户部尚书(正三品), 外祖母何氏, 受封息国夫人, 母为何氏嫡出^[11]。可见, 郑琼的祖辈——祖父和外祖, 任官都达到了高级职位。

相比之下, 杨牢的家世就要黯淡许多。首先, 弘农杨氏虽也属高门士族, 但它的声望无法与一流的山东士族高门相较。其次, 杨牢父祖的仕宦也乏善可陈, (曾祖)括, 皇钟离令。祖稷, 皇乡贡进士。考茂卿, 皇进士及第、监察里行”^[8] [P2358]。祖父连任官的资格都未取得, 父亲所任的监察御里行也非正官。如此, 郑琼父母选择杨牢为婿, 家族背景当非考虑的重点, 为说明这一问题, 请先来看表 1 杨牢和郑琼的主要生平年代:

表 1 杨牢和郑琼的主要生平年代(以虚岁计)^②

	郑琼	杨牢
生年	元和四年(809年)九月,	贞元十七年(801年)
进士及第		大和二年(828年)春 ^③ 28岁
婚年	大和二年(828年)七月 20岁	大和二年(828年)七月 28岁
婚姻存续期	约 14年	大和二年(828年)至会昌元年(841年)
卒年	会昌元年(841年)五月 33岁	大中十二年(858年)正月 58岁
夫妻年龄差	8岁	
夫妻卒年差	夫晚于妻去世 17年	

依此, 杨牢于大和二年(828年)春进士及第, 七月完婚, 也即这桩婚姻是在杨牢科举中第后促成的。这也就明确表明, 郑琼家主要看中了杨牢的才华及未来仕途。当然, 杨牢的“孝童”声名, 或也是他们看中的德性之一。郑琼与杨牢的联姻, 也体现了唐后期择婿重人物的特点。

三、杨牢的任官经历和人格特征

以事后的情况看, 杨牢虽颇具才华, 但仕途的发展, 特别是后期, 并不十分顺畅。关于唐代文官的理想仕进蓝图, 赖瑞和在《唐代基层文官》一书中谈到:

中晚唐的基层文官当中, 最成功、入仕条件最好的, 是一个进士出身, 又考中制科或博学宏词者。他往往先在京城任校书郎, 然后通过他父执辈的世

交关系, 被某个相熟的节度使或观察使, 辟为掌书记(最佳)、推官巡官(其次)。如果没有考中制科或博学宏词, 以致不能马上任正规京官或外官, 则他先到幕府任巡官或推官(如韩愈), 其实也很不错。

单就任官层次和年龄而言……校书郎、正字和赤、畿县尉, 正是本书所论的基层官员, 任官年龄约在二十五到三十五岁之间。……监察御史、殿中侍御史、拾遗、补阙、员外郎和郎中, 可算是中层官员, 任官年龄约在三十五到四十五岁之间。至于中书舍人、给事中、中书侍郎、中书令和宰相等, 则属高官, 一般年龄约在四十五岁以上^[12]。

以此衡量,杨牢早期的仕途,确是循着这条唐代文官理想之路推进的“及从时解褐,初授崇文馆校书,次任广文馆助教,次授大理评事,充充海观察推官,又奏监察里行。□职于平卢节度,岁满□□□中侍□□充岭南节度使掌记……还归上京,□州□□□朝一为著作郎,一为国子博士。”^{[8] [P2358]}但在杨牢去世时——他时年57岁,依照赖瑞的分析,他的理想职位应当是中央的如下之官:中书舍人、给事中、中书侍郎、中书令和宰相,但他仅止于外官的河南县令(正五品上),虽然从品级上,已达通贵之列,但其任职的重要与清浊,显然无法与那些理想高官职位相比。

单以杨牢的文学和吏干,他应当是有机会进达于中央紧要官的。关于他的吏干,其墓志记,在充任岭南节度使掌书记时,“所至裨补,正道斯行”;担任河南县令时,“故事有以□姓入军便为军吏者,上官特庇,牧宰不能追之。公下车搜访,悉补乡□□□朝廷大仰正直”,因此还受到了皇帝的褒赞“古人能官,何以过也!”^{[8] [P2358]}所以,杨牢仕进的蹉跎,必是事出有因。首先是他的性格。关于杨牢的性格,史书记“性狷急”^{[7] [P317]},也即心胸不宽、性情急躁、性格耿直。以现代心理学分析,这就是明显的神经质人格特征。现代心理学指出,高神经质个体倾向于有心理压力,不现实的想法、过多的要求和冲动,更容易体验到诸如愤怒、焦虑、抑郁等消极的情绪。他们对外界刺激反应比一般人强烈,对情绪的调节、应对能力比较差,经常处于一种不良的情绪状态下。而在杨牢身上,这些心理特点就多有反映。

如杨牢对待父尸,前面谈到,其父横死于镇州(今河北正定),其家则居于洛阳,他的兄长或是惧死,但两地相距遥远,也确会使人产生畏难情绪。但他面对这一难题,选择的是义无反顾,以超坚韧的意志,在隆冬时节,行走二千里山路,以至“委发羸骸”“冻肤皴痂”而无悔,这的确是一种特殊人格的体现。但他的这种人格特征,也严重妨碍了其上司和同僚的关系,“累居幕府,主人同列多不容”,这无疑对他的仕进会产生负面影响。而他对待死亡的态度,也是其神经质人格特征的写照“在青州幕,奉使出,得疾,不诊脉服药而殒”^{[7] [P317]}。

因为性格而影响了仕途,但杨牢对自己的才华又相当自负,“时辈之中,所谓拔乎其萃也,其自负之心又愈于此矣”^{[8] [P2358]}。自认才华横溢、胜于众人,但又得不到上司的赏识和同僚的认可,这就导致了杨牢经常处于愤怒、焦虑、抑郁等消极情绪中,所以“其辞多怨恚”^{[7] [P317]}。

杨牢后期仕进的阻滞,或也与其妻郑琼和弟媳杜綱的去世有关,即他失去了官场的强力家族奥援。在此先介绍一下杜綱的情况。杜綱,出自京兆杜氏,相较于郑琼,杜綱的家族背景更为显赫:

祖杜黄裳 —— 妻赵郡李氏
父杜宝符 —— 妻清河崔洪女
姑杜黄裳女 —— 夫京兆韦执谊
姑杜黄裳女 —— 河东裴瀚
从祖杜黄裳杜亚 —— 范阳卢氏

与杜黄裳家族联姻的,几乎都是名门望族,杜綱之母更是来自山东第一高门清河崔氏。其家族的仕宦更是鲜夺,祖父任宪宗朝宰相;从祖亚,至官淮南节度使;姑丈韦执谊聪俊有才,进士擢第,应制策高第,年仅二十余,即拜右拾遗、翰林学士,并在顺宗朝任宰相;二伯胜,宣宗朝几致宰相,卒官天平军节度使^⑩。

依照郑琼和杜綱的墓志,郑琼逝于会昌元年(841年),杨牢时年40岁,杜綱亡于两年之后(会昌三年,843年)杨牢时年42岁,他正处在赖瑞和所说的中层向上层发展的关键阶段。而如下面所分析的,郑琼和杜綱的去世,或许都是因为夫妻感情问题造成的,所以,她们的去世,可能对女方家族造成了一定伤害,由此而牵涉到了她们的配偶杨牢和杨宇兄弟。杨宇的仕途,或可对此推测作一旁证。

与其兄一样,杨宇也颇具才华:

及弱冠,好学,敏于文义六经微奥,有从师久不能辨者,反复机席间,心惟目想,已自晓解。又善属文,每下笔辄有新意,锋彩明健,如攄霞振英,虽劔刀不拘,而理必归正。由是当时文士如李甘、来择辈,咸推尚之。时陇西李公名汉称最重,一见所作,遂心许不可破。明年,为礼部主司,果擢居上第,年方廿八,在诸生为少俊^{[9] [P2294]}。

杨宇的才华得到了其时文士和权臣的赏识,所以在当进之年,即中进士,与其兄一样,也是一个“在诸生为少俊”的例子。中进士后,杨宇的仕途起点也不低“坎坎浮世,卑穷不伸,凡入仕一十八年,方至国子助教。”^{[9] (P2294-2295)}关于杨宇的仕进,这些文字其实也没有透露太多信息,但他的仕途起点,还是可以推测到的。杨宇28岁中举,入仕18年,去世时45岁,也就是他在登入科第后,是直接获得了官位,并未“守选”。按,在唐代,即使考中进士或明经,一般也需“守选”——等候三(进士)到七年(明经)左右,才能被分配到官职。杨宇的仕途起点虽然不错,但后期的仕进却出现了严重阻滞,在他去世时,为官仅至从六品上的国子助教,更令人费解的是,他的散品更低至从九品上的文林郎,位居文散官二十九阶的倒数第二阶。在其妻杜綰去世时,杨宇年36岁,也正处于中层向上层攀升的阶段,因而也不能排除杜綰去世的影响。

杨牢的人格特征,不仅妨碍了他的仕途,也严重影响了他夫妻感情及其妻郑琼的身体健康。

四、郑琼和杨牢的婚姻情感生活

郑琼的父母自认为女儿觅得了如意郎君,但事与愿违,因种种原因,郑琼在14年的婚姻生活中,都未能与夫君建立起恩爱、和睦的关系,也就是郑琼夫妻的婚姻生活并不幸福,这从杨牢为妻子撰写的墓志就可看出。在这一墓志的通篇文章中,对妻子的赞扬仅占极小的份量,像陈辞地称,“夫人自为杨氏妇凡14年,迁徙不暇,贫窶不怨……未报其勤,以至于此”^{[10] (P2214)},以及对妻子宽容接纳自己的别宅妇/幸婢的褒扬,另外的绝大部分内容,都是对妻子自闭性格、沉湎于自我的描述。

前面谈到,郑琼出自一个婚宦两全的高门之家,结婚时20岁,此属其时女子的正常婚龄^①;夫婿才华横溢,甚为时议所属;婚姻存续14年,育有4女,无子,子女的数量也在唐代家庭子女数的正常值范围内^②。这些基本数据显示,郑琼的婚姻状况总体正常。但其实,她的婚姻质量并不高,她的情感生活并不美满。我们先来看一段她的墓志:

牢年三十,在洛阳,尝于外有子。

既訖,夫人未之知,一旦为侍婢失语所

漏,方甚愧恐。夫人曰:“久以君无男用,忧几成病,今则且愈当贺,奈何愧为?”因以锦纈二幅赏侍儿能言,不弃隔我子于外,蚤令知母恩。内此婢,遂收养之”^{[10] (P2214)}。

杨牢的这位幸婢,其实就是一房别宅妇。所谓“别宅妇”,“是男人养在别处的、不合法的、一般瞒着妻子的情妇”,“‘妾’是法律上允许的、合法的、一般得到妻子同意的小老婆”,“传统习俗(特别是‘妒妇’们)阻挠纳妾,于是‘别宅妇’出现了”^[13]。因“别宅妇”有可能对社会(户籍问题)和家庭(夫妻感情)造成双重影响,所以唐玄宗时,曾大禁过别宅妇。而杨牢的这位别宅妇,可能就对郑琼和杨牢的夫妻生活,产生过相当重要的影响。

依郑琼的墓志,杨牢30岁时,也即大和五年(830年),于洛阳与幸婢产子;而郑琼在会昌元年(841年)33岁离世时,长女“李方九岁”^{[10] (P2214)}。以此推算,女李当出生于大和七年(833年),此时郑琼24岁,距成婚已有5年;而女李小庶子3岁,也即幸婢的怀妊,是在杨牢与郑琼结婚的次年。我们即使假定杨牢“初授崇文馆校书,次任广文馆助教”时,身居长安,而郑琼在洛阳;或其后杨牢于洛阳任官,而郑琼留于长安,但他每年也是有假期,并可以返家团圆的。关于唐代内外官的长假日,其时的《假宁令》规定:

诸元正、冬至并给假七日(节前三日,节后三日),寒食通清明给假四日,八月十五日、夏至及腊各三日(节前一日,节后一日)……内外官五月给田假,九月给授衣假,分为两番,各十五日^[14]。

即使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,7天尚不方便往返,15天则是在可返家时间内的。况且,唐代官员宦游时,一般是携家带眷的,像赴任岭南节度掌书记的李翱,其妻还在半路的衢州产下一女。所以,比较合理的解释是,杨牢与郑琼的感情一直不甚和睦,特别是在初婚的前几年时间里,夫妻的感情更是寡淡,所以在他宦游时,并不经常携郑琼同行,这也由郑琼去世的情况得到证明。郑琼逝于洛阳康俗里的家中,而其时杨牢正担任洺州沂密等州都团练观察等使下的推官,任官地为沂州

(今山东临沂),其时的夫妻二人也处于分居状态。夫妻经常是两地生活,那么杨牢的私生活,也就不在郑琼的视线内了,所以也才有了(庶子)既龢,夫人未之知”的后话。

郑琼与丈夫关系的不融洽,以杨牢的看法,原因之一或许是郑琼无子,以致使丈夫“忧几成病”。关于郑琼的生育,其墓志记,“生四女,长曰李,次曰引,次曰书,次曰马”^{[10] (P2214)}。在唐代,子嗣对一个家庭确实极为重要,唐人普遍认为无子主奠,是十分可悲之事^⑬,并且《唐律》也以“无子”为女子“七出”之首要^{[15] (P267)}。所以对于无子,杨牢夫妻两个都颇感不安,而郑琼更是愧怍有加,故而在她得知庶子的消息后,不但接回了此子,还接纳了庶子之母——“纳此婢”,郑琼的宽容与柔顺也因此展现无疑。另按,此幸婢起码在被正式接纳为家庭成员后,就当被放良为妾了,“婢为主所幸,因而有子;即虽无子,经放为良者:听为妾”^{[15] (P257)}。

而问题是唐人纳妾是比较普遍的,杨牢完全可以以正当的方式纳妾或幸婢,而不必私养别宅妇,并由此而产生“愧恐”,杨牢自己都认为,郑琼并非悍妒之妻,事实也证明确实如此,也即来自妻方的纳妾、幸婢压力,也并不存在。如此,杨牢就当对郑琼另有所忌。实际上,杨牢忌惮的并不是其妻郑琼本人,而是她的家族背景。前面谈到,唐人做官是需要政治奥援的,像科举的温卷、官位的迁转——以父执辈的世交关系谋得节镇的官位,等等,都需要朝中有人援助,而杨牢以郑琼为妻,除了她的门第外,最重要的还是需要获得其内、外族高官族人的支持与提携,所以 he 不想与郑琼及其族人交恶。

但杨牢对郑琼又实在无法建立起感情,而且以他偏狭的性格,也不会就此作太多改变。在郑琼以不妒之德“纳此婢”后,杨牢对妻子的感情或稍有改善,这也算是他对郑琼宽容柔顺的回报,所以其后与郑琼又相次产下了三女。但正妻与幸婢的矛盾还是存在,而且还是在同一屋檐下存在着。关于唐人与妻、妾的生活和感情,陈尚君先生指出:

因为妻有其位而备于礼,既是家族荣耀的象征,又是道德礼仪的楷模,而妾则出身卑微,仅以色艺事人,大致可

以借用前人论词的话来概述,即妻庄而妾艳,在家庭中分别担负各自的角色。从唐人墓志中,还很难深入地了解他们私人生活的具体状况,但可以有充分的理由相信,男子的性需求更多地会在妾的一方得到满足^[16]。

这不但可以解释郑琼5年未生育的原因,还可说明郑琼、幸婢与杨牢的情感关系。杨牢的墓志显示,在他去世时是有两子的——“遗命二子”,这个次子或也是这位幸婢所生,而且还是在进入杨家、与郑琼阖宅共处时所生。

在幸婢依然是丈夫身心第一寄托的情况下,郑琼的感受又如何呢?我们再来看她的墓志:

夫人性闲默澹重,不喜华饰,每亲戚会集,以一出户犹登山涉江。在夫家凡十四年,于晨夕侍问,鲜及庭砌,未尝出行。去家仅逾年,夫人之姊既寡,告别适淮海,以车舆召夫人,语分离。夫人辞曰:“某闻妇人送迎不出门,见兄弟不逾门,今姊虽远诀,且束于圣人之教,不得尽私爱,不敢往。”其姊竟不能强。遂就其家而诀去^{[10] (P2214)}。

郑琼不喜交际、过着人际关系中的“孤独世界”,性格悲观,神经质。依据夫妻心理学的分类,她与杨牢完全符合“沉默寡言型”的封闭式夫妻关系,而在人际交往中,这种交往方式最为消极,“这种将自己闭锁起来的方式,在和他人的时候,通常都是处于被动的地位”。交往中产生自闭的原因有很多,其一是自尊心的低落与自卑,因而会出现无法与别人交往的情形,从而呈现一种儿童性自我状态,也即“面对精神上的痛苦、纠纷的时候,为了保护自己,会采取儿童时代的防御手段。当儿童遭遇精神上的痛苦的时候,他们学会将身体、心理封闭在自己的壳中,来保护自己的安全”^{[17] (P24-28)}。依照杨牢的看法,郑琼的沉默寡言和自闭,是源于她固有的性格,“性闲默澹重,不喜华饰”;但以郑琼的心路分析,她在本家时或许是内向、敏感的,但自闭应是在婚后出现的,因为在她“去家仅逾年,夫人之姊既寡,告别适淮海,以车舆召夫人,语分离”,她是坚持不往,她们姊妹一同长大,姊妹当深知她的性格,如果在本家时她就是自闭

的,她的姊姊理当不会产生“以车舆召夫人”的想法的。

郑琼婚后产生自闭,当是诸多无奈现实造成的,如无子,但更重要的,还是丈夫的情感不在自己身上。夫妻心理学指出,“性是你表现你的爱的一个途径”,“不论我们怎么‘说’,行为语言永远不能装假。言语的说谎太容易,但要控制你的身体使它说谎,却太难”^{[17] [P130]}。郑琼是敏感的,在她的一生中,或与丈夫身处两地,或虽同居一个屋檐下,但丈夫另有所爱,对此,她都心知肚明,她只能“将身体、心理封闭在自己的壳中,来保护自己的安全”。

得不到丈夫的爱,会使妻子产生悲观情绪,郑琼也是这样,对此,她的墓志记:

然性本悲怯,每自疑不寿,固云:吾年七岁时,在京城,有以《周易》过门者,先夫人为吾筮之,遇乾之剥,以吾之寿不能过三十。由是以佛道二教,恳苦求助。因衣黄食蔬,三元斋戒,讽《黄庭》《道德经》,余日则以《金刚》《药师》《楞伽》《思益》为常业,日不下数万字。晦朔又以缙钱购禽飞,或沉饭饱鱼腹。以是恳急,因致愁惑。又恶闻哭声。及丕吉口语,常令小儿持笔,题其户牖岩壁之上,为大吉长寿字,每一览之则暂喜,如违客得家信。庚申年,夫人尝得疾,服药未效,因自以《焦氏易林》筮之,遇中孚辞,既恐惑,因多恶梦,既逾年而终^{[10] [p2214]}。

依杨牢所说,郑琼的悲观情绪,主要来自幼时母亲为她卜筮所带来的心理压力,更来自她对自己寿命的担忧,这或许是诱因,但更深层次的原因,还是得不到丈夫的爱,这从郑琼阅读并以此占卦的《焦氏易林》就可推断。《焦氏易林》是汉代流传下来的一部《易》学著作,它描写了众多的妇女人物与形象,也展现了这些妇女的情感世界,智宇晖对此的研究显示:

作者为了形象喻示卦象的含义,以现实人生和情感现象作为取喻之源,却不经意中展现了女性丰富的生活世界。在女性的情感领域,她们的等待与孤独成为作者反复表现的一个方面,而缺乏

对幸福快乐层面的关注,这样无意中透露了封建时代女性情感世界的一个主导性特征:无助与无奈^[18]。

这实际就是郑琼婚姻情感的写照,她虽然在庶子童年前,并不知道他及其生母的存在,但以她的敏感,丈夫的心与身的向背,她是完全能够揣测、体会到的,所以,她也是在等待与孤独、无助与无奈中度日的。《焦氏易林》的这种女性观,正契合了郑琼夫妻生活中的悲观感受。

婚姻中第三者的介入,不但会影响妻子的情绪,可能还会损及妻子的健康,致其气郁而罹疾,因唐代的相关医案有阙,我们就选取3个明代医案,来对此进行说明,它们来自明代著名女医谈允贤的医著《女医杂谈》:

病例1:“一妇人年四十三岁,其夫因无子娶一妾,带领出外,妇忧忿成疾。”^{[19] [P2-3]}

病例2:“一妇人年五十六岁,得患,嗝气半年,诸药不效,某询其故,云因夫贵娶妾,忧忿成疾。”^{[19] [P12]}

病例3:“一夫人年三十二岁,生四胎后,十年不生,因无子,甚是忧闷,某询其故,乃因夫不时宿娼。”^{[19] [P13]}

这3位妇女或因丈夫纳妾,或因丈夫眠花宿柳,而“忧忿成疾”。同样的感受,还来自于一位更知名的才女王端淑(1621—1701年),她有一首诗的题目就是《甲申春,予脱簪珥为(夫)睿子纳姬,暱甚,与予反目》,此诗描述了她出资为丈夫纳妾,而丈夫却对聪明可人的陈姬疼爱有加,并与她反目,这使她不但极生郁闷,而且生活在被弃的恐惧与绝望中,“捐弃应知难复旧,徘徊寂寞伴凄风”^[20]。当然,中国传统社会的婚姻制度就是一夫一妻多妾,妾的普遍化与合法化,已使很多嫡妻对此习以为常,并予正面接纳。但以人性的正常反应,妾的存在无疑会对嫡妻造成负面影响,这是不争的事实,只是因人而异、程度有别而已。

再回到郑琼,虽然她对丈夫的别宅妇予以了极大的宽容与不妒,但她的内心感受,或与这4位女子无异。郑琼在33岁的韶华之年就去世了,其或许就是长期忧忿郁结、健康日渐糟糕的结果。我们再举两个唐代的案例:

例1:李瑛妻卢氏。李瑛,名相李绛次子,卢

夫人虽门第颇高,但父祖为官不显。卢夫人 13 岁出嫁,“嫁二年而寒暑为恙,若心智眩悸,然故常膳由减,步履微艰”^[21],19 岁即离世。卢夫人在婚后身体的迅速转衰,或与李頔之妾章四娘的存在有密切关系,这从卢夫人和章四娘的墓志可以看到。卢夫人的墓志为娘家人所写,而章四娘的墓志则出自李頔之手,“更重要的是,志中有句如‘頔主章氏十有二载,至于情义,两心莫辩。衔涕编录,万不纪一’,十足是恋人的口吻”。陈弱水先生对卢夫人的夭逝,提出过疑问“卢氏的婚姻可能并不美满,她所谓的身体长期不佳,到后来归返本家,是不是都跟无法与丈夫建立紧密的关系有关?”^[22]答案当然是肯定的。

例 2: 唐思礼妻王太真。唐思礼在给亡妻所撰的墓志中称,王夫人“幼德敏慧,丽质天成。容止毕修,婉淑有裕”,“善于音律,妙鼓胡琴”,德、

貌、才俱佳,并能极尽为妻之“淑德”,特别是“又有女奴,每许侍余之栉。以己之珍玩之物,俾自选以宠与之,其宽容柔顺卹下如此也”。这种看似不妒的态度,或是因为王太真自己的多年无子,“夫人来归余室,周七年矣。或曰:嗣事甚严,宜有冢子。于是祈拜佛前,志求嫡续”,她最终产下一子,但“不育,夫人方在蓐中,而伤惜之情,不觉涕下。三更,夫人无疾,冥然而终于河中府官舍”。在她去世时,有庶出的“一男曰丑汉,今七岁,一女曰遂娘,始三岁”^[23]。在王太真婚姻生活的 7 年中,长时间面对的是自己的无子和“女奴”的得宠与产育,王夫人原本“依归佛”,她或也以这种方式寻求精神和情感的解脱,但最终还是在 23 岁,因产子问题“忧忿成疾”而终。

最后还有郑琼的妯娌杜綯。我们也依杨宇和杜綯的墓志,揣度一下他们的婚姻生活^④:

表 2 杨宇和杜綯的主要生平年代(以虚岁计)

	杜綯	杨宇
生年	元和十一年(817 年)	元和二年(807 年)
进士及第		太和八年(834 年) 28 岁
婚年	开成四年(839 年) 23 岁	开成四年(839 年) 33 岁
婚姻存续期	4 年	开成四年(839 年)至会昌三年(843 年)
卒年	会昌三年(843 年)二月 27 岁	大中五年(851 年)八月 45 岁
夫妻年龄差	10 岁	
夫妻卒年差	夫晚于妻去世 8 年	

杜綯于开成四年(839 年)、23 岁时嫁给杨宇,会昌三年(843 年)27 岁去世,生一女周,时年两岁;杨宇大中五年(851 年)去世,此女 10 岁,同时,“他出二男,长者甚愚不可齿。次曰阿门,性仁敏,九岁临丧,有哀节”^{[9] [P2295]},如此,这位长男至少已有 10 岁或以上了。由此看,杜綯婚姻中的人际关系也同样复杂,她与丈夫的情感中间,同样有第三者的存在。而这样的夫妻关系,或也促使她与本家的关系一直很亲近,在杨宇为妻子撰写的墓志中,仅有 60 字来形容杜綯的为妇、为媳、为母之德,但却有 131 字来描述她与本家父母的至亲关系,在杜綯成婚后的生活中,本家与夫家孰轻孰重,从这里就可见一斑。

作为娣姒的郑琼和杜綯,生活中交集的时间并不长,杜綯于开成四年(839 年)与杨宇结婚,进入杨家,而郑琼在两年后的会昌元年(841 年)就

去世了。虽然如此,两娣姒应当是有所交往的。按,郑琼于会昌元年逝于东都康俗里,两年后,杜綯终于洛阳的尊贤里,在两位女子生命的最后阶段,都生活在东都洛阳,她们并未阖族共居,但两家的距离并不远,康俗里与尊贤里都位于洛阳城南,康俗里居定鼎门街东第四街从南第二坊,尊贤里则在长夏门东第二街从南第二坊,两坊间仅隔另两坊。另外,在郑琼去世时,杨宇的母亲也在东都,“长女”李方九岁,枕其尸,哭绝良久,有如天成。祖母怜其哀,恐至毁灭,遂命置他室”^{[10] [P2214]}。杨宇的母亲或许是在儿媳去世时,暂往杨宇家协助处理丧事的,平时还是跟随次子杨宇生活,也就是杨宇诗中所说的,“尔养晨昏我远游”。婆母在,儿媳定当按时前往问安,所以,婆母在杨宇家时,郑琼自当前往。这样,婚姻并不幸福的郑琼、杜綯两娣姒,或许会对自己的婚

姻感受有一些交流,也以此暂时排解一下心中的郁结。

五、赘语

在《论缠足的起源》一文中,高彦颐先生就文化史的特点指出“文化史并不仅是引入新的课题或拓展史料;它更是转变历史的目的和历史学家的自我认知。文化史并非是对历史真理和确定性的研究,它更多的是在于解释和商讨的过程:在文字和实物,现在和过去,历史学家和历史话题之间。对于缠足起源的探讨,与对其他历史话题的研究一样,它的最终分析是为了探讨未知的和不可知的。”^[24] 本文就是循着文化史的这一思路撰写的,特别是对男性书写与女性体验之间的缕析,以不同时期妇女同理心所作的分析,都是本文所作的尝试。笔者希望通过郑琼情感世界的分析,提出一种在女性史料缺失时,考察妇女自我感受的路径。文中所作的探讨不是结论,只是就这个问题所作的一种解释和商讨而已。

注释:

- ① 特别感谢“中国古代社会性别史原典选读”一课的所有老师与同学,特别是张绍峰和段舒扬两位同学。
- ② 在琼·斯科特提出的社会性别理论的第一命题中,四个构成之一就是“主观认同”,她强调,“历史学家们应该研究性别认同内容构成的方式”(《性别:历史分析中一个有效范畴》,刘梦译,载李银河主编的《妇女:最漫长的革命》,北京:三联书店,1997年,第168-169页)。
- ③ 像著名的《女论语》,对其争论就极多。参见拙著《中国古代妇女史研究入门》,北京大学出版社,2014年,第106-108页。
- ④ 所谓“同理心(empathy)”是指一个客体人性化的过程,即感觉我们自己进入别的东西的过程,又叫做换位思考、神入、共情,指站在对方立场设身处地思考的一种方式。
- ⑤ 目前对郑琼、杨牢夫妇的研究,主要侧重于生平和文学成就。参见周晓薇的《杨牢进士及第年分辨证》,《陕西师范大学学报·哲社版》1996年第1期,第41页;王七一、周晓薇的《唐代书目补遗二十四种》,《渭南师专学报(社科版)》1993年第1期,第44-45页;胡可先的《出土文献与唐代文学史新视野》,《文学遗产》2005年第1期,第47-59页;顾纪忠的《杨牢考》,《阜阳师范学院学报·社科版》2007年第1期,第39-40页;张海燕的《唐荥阳郑琼墓志释文校

补》,载邓章应主编的《学行堂语言文字论丛》第4辑,2014年,第201-214页;曹圆的《唐代诗人墓志丛考》第二章第二节,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,2008年,第40-41页。

- ⑥ 传统史料记杨牢于18岁进士及第,据周晓薇的辨证,其当是虚岁二十八岁中第。见周文《杨牢进士及第年分辨证》,《陕西师范大学学报·哲社版》1996年第1期,第41页。
- ⑦ 以下对郑琼墓志的引用,参考了张海燕的《唐荥阳郑琼墓志释文校补》一文。
- ⑧ 本表主要依据郑琼和杨牢夫妻墓志的记载,并加以推算而成。
- ⑨ 唐代科举放榜时间一般在二月,但也有早到正月、晚到三月的情况。参见吴宗国的《唐代科举制度研究》,辽宁大学出版社,2010年,第61页。
- ⑩ 以上部分参考了王力平的《中古杜氏家族的变迁》,商务印书馆,2006年,第168-172页。
- ⑪ 参见蒋爱花的《唐代家庭人口辑考——以墓志铭资料为中心》,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,2013年,第34、146页。
- ⑫ 参见张瑞华的《唐代妇女的生育研究——以墓志资料为研究中心》第二章,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,2008年,第8-13页;蒋爱花的《唐代家庭人口辑考——以墓志铭资料为中心》,第145-149页。
- ⑬ 卢公墓志铭记“公何不幸,独受天罚,身歿无嗣,人口主丧”(《唐代墓志汇编》,第1935页);窦夫人也是“殒于韶岁,有女无男,虽闻哭泣之声,而无丧祭之主,此又痛中别有痛”(《唐代墓志汇编》,第1630页)。
- ⑭ 本表主要依据杜綯和杨宇夫妻墓志的记载并加以推算而成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 孙康宜. 老领域中的新视野——西方性别理论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的探索和突破[A]. 张宏生. 明清文学与性别研究[C]. 南京:江苏古籍出版社,2002. 959.
- [2] Alf Ludtke. Introduction [A]. *The History of Everyday Life* [C]. New Jersey: Princedon University Press, 1995. VIII.
- [3] 薛巍. 小数据的挖掘方法[J]. 三联生活周刊,2017,(17): 148-149.
- [4] 钱穆. 略论魏晋南北朝学术文化与当时门第之关系[A]. 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(三)[C]. 台北:东大图书有限公司,1977. 171.
- [5] 欧阳修. 宋祁. 新唐书[M]. 北京:中华书局,1975. 4291.

- [6] 全唐诗(九) 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99. 6599.
- [7] 王说. 唐语林[M]. 周勋初 校证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87.
- [8] 李绉. 唐故河南府河南县令赐绯鱼袋弘农杨公(松年)墓志铭并序[A]. 周绍良. 唐代墓志汇编[C]. 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1992.
- [9] 杨牢. 唐故文林郎国子助教杨君墓志铭[A]. 周绍良. 唐代墓志汇编[C]. 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1992.
- [10] 杨牢. 荥阳郑夫人墓志铭[A]. 周绍良. 唐代墓志汇编[C]. 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1992.
- [11] 韩愈. 息国夫人墓志铭[A]. 韩愈, 马其昶 校注, 马茂元 整理. 韩昌黎文集校注[C]. 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2014. 484-485.
- [12] 赖瑞和. 唐代基层文官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2008. 10.
- [13] 黄正建. 唐代“别宅妇”现象小考[A]. 邓小南. 唐宋女性与社会[C]. 上海: 上海辞书出版社, 2003. 253-259.
- [14] 仁井田陞. 唐令拾遗[M]. 长春: 长春出版社, 1989. 661.
- [15] 长孙无忌 等. 唐律疏议[M]. 刘俊文 点校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83.
- [16] 陈尚君. 唐代的亡妻与亡妾墓志[J]. 中华文史论丛, 2006 (2): 55.
- [17] 柏桦. 夫妻心理学[M]. 北京: 西苑出版社, 1999.
- [18] 智宇晖. 《焦氏易林》中女性形象的文化意蕴[J]. 齐鲁学刊, 2012 (4): 111-114.
- [19] 谈允贤. 女医杂言[M]. 北京: 中医古籍出版社, 2007.
- [20] 王端淑. 映然子吟红集[M]. 清刻本. 42.
- [21] 周绍良, 赵超. 唐代墓志汇编续集[M]. 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2001. 912.
- [22] 陈弱水. 隐蔽的光景: 唐代的妇女文化与家庭生活[M]. 桂林: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09. 253.
- [23] 唐思礼. 亡妻太原王夫人墓志铭[A]. 吴钢. 全唐文补遗(第三辑) [C]. 西安: 三秦出版社, 1996. 250.
- [24] Dorothy Ko. *Search Footbinding's Origins* [A]. 邓小南. 唐宋女性与社会[C]. 上海: 上海辞书出版社, 2003. 409.

Women's Self-Perception: Zheng Qiong and Yang Lao's Conjugal Feelings and Marital Life

LI Zhi-sheng

(Peking University , Beijing 100871 , China)

Abstract: Self-perception is important content in Gender theory and a useful tool to measure women's marital feelings. The research of women's self-perception might change fixed views of some historical topics. Acquisition of women's self-perception often comes from female writings. However, women rarely wrote in the T'ang Dynasty, thus leaving us some documents hard to tell real or faked. Therefore, women's self-perception is a tricky area in women's studies of the T'ang period because of scarce materials. The article chooses a couple Yang Lao and Zheng Qiong to analyze their marital feelings, especially Zheng Qiong's psychology and feelings. The article would like to provide a new method for studying women's self-perception when female historical materials are scarce. The discussion is less a certain conclusion than an interpretation or proposition from a cultural historical perspective.

Key words: self-perception; female documents; empathy; cultural history; conjugal feelings

(责任编辑 鲁玉玲)